

● 中国文学

《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²⁰⁾

——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

易竹贤,陈国恩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易竹贤(1935-),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陈国恩(1956-),男,浙江鄞县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何国瑞先生在《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一文中,严厉批评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并认为一些教授、评论家极力称赞这部作品,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何先生的批评表现出了主观性、片面性和教条化的特点。对他文学批评中的观念和方法,本文提出商榷。

[关键词] 文学批评;主观性;片面性;教条化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99-05

何国瑞先生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发表《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一文,在联系当前文艺创作实践时,严厉指责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这样的批评方式,近年已属罕见。但作为一种曾经广泛流行过的僵化观念与方法,如果不加批评,还是有相当危害性的,因而特予以辨析。先引原文如下:

莫言的《丰乳肥臀》更是颠倒黑白,对革命极尽丑化之能事。共产党人(鲁立人等)、贫农革命功臣(哑巴孙不言等)、人民政府的干部(上官盼弟等)被描写得极端残忍、丑陋。土改时县长鲁立人在坐着轿子下乡搞土改的“大人物”的示意下,竟把司马库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引者按:实为双胞胎的女儿]枪杀了。而地主维持会长(司马亭)、地主国民党反动军官(司马库)等则成了仁爱、正直、果敢、英俊的男子汉。哑巴兄弟宰吃了司马家一头大骡子,司马库反

倒奖给五块大洋。同一母亲所生,投奔了革命的五姐的乳房是“凶悍霸道”的“宛若两座坟墓”,“头发粗得像马鬃”;而先与土匪汉奸沙和尚私奔,后与司马库私通的大姐的乳房则是“清秀伶俐”的“上等品”,“闪烁着玉一样的滋润光泽”。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10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我们无意对《丰乳肥臀》作全面的评价,也不认为这部小说无可挑剔。我们只想指出,何先生的立论和判断基于僵化的观念,显示了自己的谬误。

《丰乳肥臀》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主要故事情节以“母亲”为中心展开,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描写了上官家三代十几个人在风云变幻中各自不同的坎坷命运。作者的一个重要意图,是突破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创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就像作品中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七姐上官求弟说的:“穷

人中有恶棍,富人中有圣徒。”因此,我们看到,很难用好与坏、革命与反革命的框子来套他笔下的人物:沙月亮曾奋勇杀敌,是一个抗日英雄,因为军事上坚持不住竟投敌当了汉奸,后来又由于要救女儿枣花,冒死突入共产党军队的伏击区当了俘虏,上吊自杀。司马库把自家的酒倒在桥头上放一把火,与日本人狠狠干了一仗,然后拉起一支队伍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支队长。抗战胜利后,他先是在家乡缴了共产党部队的械,不久又受共产党军队的奇袭被俘获,在押送途中逃跑,最终听说他的岳母等人因他而受刑,就毫不犹豫地主动投案,被处死。司马亭当过维持会长,在日寇进入村子前的紧要关头,他却登高报信,让乡亲们赶快逃命。鲁立人,知识分子出身,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政委,为纪念牺牲的战友而改姓鲁。土改时,贫农徐瞎子为泄私愤,编造人命谎言要挟时任县长的鲁立人枪毙司马库。不满 10 岁的双胞胎女儿,他始则拒绝,继则为避嫌(他与司马库、沙月亮是连襟),违心地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解放后,鲁立人仕途不顺,三年自然灾害时已被贬为农场场长,后在洪水中猝死。五姐上官盼弟,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曾与丈夫鲁立人一起参与捕获沙月亮、司马库的战斗。在徐瞎子无理纠缠要枪毙司马库的女儿、她的外甥女时,她十分愤怒,但又无能为力。大跃进时期,她与丈夫一起被贬到农场,改名马瑞莲,为制造“头条新闻”,搞起了荒唐的驴猪、马牛、羊兔的人工杂交试验。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冲击,自杀身亡,留下遗言:“我是上官盼弟,不是马瑞莲。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到头来落了个如此下场,我死之后,祈求革命群众把我的尸体运回大栏镇,交给我的母亲上官鲁氏。”母亲上官鲁氏养了 9 个儿女,她的女婿中有不少风云人物:敌伪时期沙月亮得势,国民党时代司马库吃香,共产党得天下后,鲁立人、上官盼弟当了官。三女婿哑巴孙不言也是革命功臣。她的几个女儿也很不平常,其中大女儿来弟先为反抗包办婚姻与沙月亮私奔,成了寡妇后帮母亲拖儿带女逃避战乱,像一头牛,承受着重负。当鲁立人下令枪毙司马凤、司马凰时,她用自己的躯体挡住孙不言的枪口,企图拯救孩子。后来,她违心地嫁给载誉归来却失去了双腿的三妹夫孙不言,而又不堪忍受其疯狂的性虐待,打死了丈夫,被判处死刑。不言而喻,上官鲁氏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可她以母亲的朴素感情和博大胸怀容纳了女儿们的反叛;又常常拒绝女儿们在得势时的关照,却在落难时节为她们撑起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首先在道德上就不会先贤的遗教(受婆婆和丈夫的折磨,被

迫向许多男人“借种”),甚至打死了发疯的婆婆,可是她的确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母亲,就像作者在书的封底的题词中说的:“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她像大地一样朴素无华,像大地一样受人蹂躏,承受着人间的苦难。

介绍这些人物,目的只在于跟何国瑞先生的判断进行对照,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显然,莫言写鲁立人、孙不言、上官盼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纯粹的阶级抽象符号来写,他们是具体的存在,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标准意义上的“共产党人”、“贫农革命功臣”、“人民政府的干部”。他们参加了革命,立下不少功劳,但也犯过许多错误,甚至在人格上存在着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缺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缺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给革命带来损失,也给他们自己制造了悲剧。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上官盼弟式的人物(追求理想,却在政治运动中自我异化,最终用生命的代价回复到本来的“我”),在建国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难道还少见?他(她)们的命运,折射出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反映了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更不用说有些人格和政治品质极为恶劣的野心家钻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在后来干下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情,对这样一些“共产党人”,还能说他们是共产党人?只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勇于承认人的复杂性。对于历史的教训,遗忘或者采取故意回避的态度,都是对于历史的背叛,于当下现代化建设毫无益处。可是,在何先生看来,鲁立人就是“共产党人”,孙不言就是“贫农革命功臣”,上官盼弟就是“人民政府的干部”,并断定作者把他们写得“极端残忍、丑陋”,为此竟不顾作品其实把鲁立人写得颇为英俊:一个白面书生,连母亲上官鲁氏都断定,他的才干见识远在沙月亮之上,并以朴素的人生经验预言沙月亮一定会败在他的手里。鲁立人下令处死司马库的双胞胎女儿,内心也并非毫无斗争,相反,他展开了人情与已被扭曲了的“阶级觉悟”之间的尖锐冲突。这一切,只能说明人的复杂性。作为一个革命者,鲁立人有比较高的政治觉悟,可是他不是个完人。他有时也无法抗拒历史的定命,无法抗拒某种错误路线的压力。只要看看“文革”中出了那么多大小野心家,那么多人成为现代迷信的牺牲品,而这些人大多受过党的教育,经历了革命战争岁月的严峻考验,知道这点,就不难明白人有时真的只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迷!同样的道理,还有哑巴孙不言,先天性的生理缺陷,加上缺少家庭温暖,从小心理发育不健全,打仗勇敢,可也比较残忍,而且性变态。这并不奇怪,难道仅仅因为他机缘巧合参加

了革命,立了功,就不应该有“这一个”具体的人,就应该把他写成一个英俊多情的白马王子?明眼人至此已经可以看出,何先生的意思原来是,“共产党人”、“贫农革命功臣”、“人民政府的干部”,一经在作品里出现,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就是对于共产党、对革命、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还有这样的逻辑,倒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不过即使是按照何先生的观点,事情恐怕依然难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很难给这些人划定成份。母亲上官鲁氏,究竟是富农,贫农,抗属,汉奸家属,革命家的母亲,还是大贪污犯的姥姥(她外孙女鲁胜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上了某市市长,因贪污巨款而被判处死刑)?鲁立人,难道何先生就能保证他没有历史问题,说不定他的“残忍”或者动摇,正是他本性的暴露,那样一来,不正好是作者揭露了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为“革命”立了一功?五姐上官盼弟,不知何先生应算她受母亲的哪一种角色定位的影响,或许她继承了母亲“反动”和“作风不正”的一面,投机革命,那么,她的乳房像“两座坟墓”,也无不可!她后来落得个可悲下场,而且向母亲表示忏悔,就是她的自我暴露,是不是说明她本来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哑巴孙不言,强奸了三姐,差一点被鲁立人枪毙,何先生能不能戴他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他还算不算“贫农革命的功臣”?大姐上官来弟迫于情势违心嫁给孙不言,受尽残酷的性虐待,在眼看她心爱的鸟儿韩要被哑巴卡死的紧急关头,在救助无效的情况下从旁打死了行凶的丈夫,这算不算正当防卫,理该罪减一等?罢,罢!这些大都是极无聊的罗织罪名的把戏,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血统论”,然而这也正是可以从何先生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结论。

其实,何先生的理论并不新鲜,不过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论的重现,形而上学的写“本质”论在当前的复活罢了。按照 20 多年前曾经广泛流行过的这套理论,文学作品中,人必须截然划分成好与坏、革命与反革命。革命者高大完美,反革命者要想方设法让他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换言之,就是把具体的人抽象化,把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看做是某一阶级本质特性的符号,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张魔床,按照它的尺寸,把活生生的人长的截短,短的拉长,务必使之合乎先验的标准,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表现出一个作家严正的革命立场。可是这样写出的作品成败如何,相信只要不是患了遗忘症者,就不难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找到答案。

我们还要指出,何先生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是比

较深的。因为他看到莫言把“投奔了革命的五姐的乳房”写成“凶悍霸道”的“两座坟墓”,而“先与土匪汉奸沙和尚私奔,后与司马库私通的大姐的乳房则是‘清秀伶俐’的‘上等品’”,就感到义愤。这是基于同样的,但无疑又是更趋极端的逻辑:参加革命的,本应该有上等的乳房;嫁给坏蛋的,乳房必须是“两座坟墓”。可是,何先生没有看仔细:大姐与沙和尚私奔时,沙和尚还没有当汉奸,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土匪”,恰恰相反,他是“黑驴鸟枪队”——“抗日总队的别动队”的头儿,专打日本人,此前此后还干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正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男子汉,大姐才抗拒母亲的包办婚姻,死也不肯嫁给哑巴(后由鲁立人取名为孙不言),要跟着他私奔。如果说沙和尚抢来许多珍贵的毛皮大衣送给上官家的女儿,就说他是“土匪”,何先生恐怕也会因此承担混淆阶级阵线的“罪责”。因为很显然,沙月亮此时所抢的肯定是地主老财的家,这样的农民革命的“壮举”,何先生怎能丧失“革命”立场指其为土匪行为?其实,作者写大姐与五姐的乳房,是从一辈子吊死在女人奶头上的小弟上官金童的视角出发的,显示的只是人的个体差异。世上毕竟也不会有“好女人”须有美丽的乳房、“坏女人”只配长丑陋的乳房这样的道理,更何况大姐与五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好女人”与“坏女人”。如若再按照何先生的这套逻辑推论下去,结果可能竟是任何过来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的,因为何先生写道:“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 10 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这无疑是在暗示,这些教授、评论家居然称赞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他们也难辞“近乎反动”之嫌。是不是还要追查一下中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有没有暗藏的“近乎反动”分子,因为他们居然把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租给举办者进行颁奖仪式,而且奖金有 10 万之多!至少他们要对此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

这样的罗织罪名方式,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所幸它现在已失去了存在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否则倒真的会把一大批人置于死地。这说明一个道理:观念陈旧,思想僵化,对历史的进步怀着疑惧和抵触的情绪,就会导致一个人判断力的扭曲。

其实,描写革命战争的历史题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保卫延安》《红日》和比较通俗化的《铁道游击队》,建构了一个正面描写敌我双方战斗,歌颂英雄主义、表现革命者豪迈气概的叙事模式。到新时期的《西线无战事》,有所突破,开始把战争转为背景,重点写战争中的平凡战士的内心世界。事实表明,这些战

士同样是真正的英雄,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这实际上也是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反映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风格的继承和发扬。到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关于英雄的固定模式,塑造了梁三喜这样朴素而伟大的英雄,斩开来这样没能评上“英雄”的英雄的光辉形象。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和这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则走了一条非传统的写实路子。他既无意展示战争的过程,也不表现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很大程度上是把小说寓言化了,使生活成为对于人性善恶的一次拷问,来展开我们苦难民族的浸透血泪的历史。这种关于战争题材的创作风格的变迁,这种关于英雄人物的观念的转变,是符合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辩证法精神的。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当然要体现出当代性,反映当代人在现实情势的制约下对历史的审视角度和认知结果的独特性。可资比较的是,中国的这一趋势与苏联文学中战争题材小说的风格演变是大体一致的。在苏联,前有《毁灭》《静静的顿河》,后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从正面表现战斗英雄逐渐过渡到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当然也必然包括人的阶级性);它淡化了硝烟味,却增加了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性。这中间不能说毫无问题,比如莫言的这部《丰乳肥臀》,就写得粗野一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探讨的,但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扣一顶“反动”的政治帽子把作家和作品一棍子打死。如果只允许存在一种战争题材的创作模式,即使它绝对的“正确”,我们认为也是要不得的。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花独放只能断送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

还需要指出的是,莫言的小说至多是不符合何先生的个人标准,但显然不能因此就说它不配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是风格多样,生动丰富的。只要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增加对人的认识深度,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净化人的感情,使人变得高尚起来,成熟起来,哪怕这人一辈子成不了英雄豪杰,只是平头百姓一个,这文学照样也有意义,有它存在的理由。另外,文学的社会作用一般是间接的,它联系着作者和读者,中间有很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接受机制。高腔大调未必能激发人的斗志,伤感的作品未必会使人堕落,欢快的未必深刻,令人痛苦的未必没有价值。许多时候,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人们看过悲剧,热泪盈眶,内心却得到了净化,像一碧万里的晴空,感到世界的光明,生活的美好,人道和正义的永恒。这日会激励他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

斗。换言之,判断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应该基于比较宽泛的正义立场和美的标准,考虑到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不能简单化、教条化。至此,有必要再引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的一段话,鲁迅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1](第 338 页)《丰乳肥臀》当然不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但鲁迅指出的“从前”小说的模式化的缺点和《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优点,是很有启示性的,他对一些中国人“满心是利害的打算”提出的批评,更值得大家认真反思。

总观何先生文章在批评上的问题,我们认为,一是主观性:把具体的人当做某种类型的抽象符号,用先验的标准要求作品里的人物,而不是从作品所揭示的客观实际社会关系出发分析人,研究人物塑造的成败得失。二是片面性:只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作品里人物的某一阶段的表现,把他们与特定的环境割裂开来,与他们的整个人生道路割裂开来,加以曲解。三是教条化:抱着一套 20 多年前曾经流行的理论,用政治批判代替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甚至上纲上线,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其总的思想根源不外乎一种流行过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把人当做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抹杀了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把文学当做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工具,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用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来指导创作,毫无疑问,丰富多彩的生活会失去光彩,活生生的人会变成一些毫无生气的木偶。在批评中贯彻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则批评家的理性判断力和审美判断力就有可能被扭曲,从而得出违反生活法则和艺术法则的结论。我们钦佩何先生的钻研精神,他在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时有论著发表,但他对《丰乳肥臀》的批评受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是比较深的。有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觉得对这种理论和思想方法的危害性不可掉以轻心,所以严肃地提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

要克服这种理论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性,最关键的一点是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上来。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邓小平同志在保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2](第 182- 185 页)这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同时又克服了《讲话》的某些历史局限。今天,我们在文艺创作中提倡主旋律和风格的多样化,就是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自觉贯彻邓小平文艺

思想的结果。拿邓小平同志的文艺观点和党在新时期实施的“两为”文艺方针,与何国瑞先生对《丰乳肥臀》所作的政治批判式的文艺批评对照,何先生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参 考 文 献]

[1] 鲁 迅. 鲁迅全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何良昊)

Is “The Full Breast and Fleshy Buttocks”
“Nearly a Reactionary Work”?

—— On the View and Method in Mr He Guo-rui’s Literature Criticism

YI Zhu-xian, CHEN Guo-e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YI Zhu-xian (1935-),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HEN Guo-en (1956-),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article of “The Art to Eulogize the Revolutionary violence,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The Second Article on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Art”, Mr He Guo-rui shows the trend of subjectivism, one-sidedness and dogmatism when he severely criticizes MO Yan’s novel “The Full Breast and The Fleshy Buttocks”. This articl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his view and method in literature criticism.

Key words literature criticism; subjectivism; one-sidedness; dogmatism